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以小 博大

——越美巴黎谈判
(1968—1973)

ASYMMETRIC GAME:
PARIS NEGOTI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68-1973)

Cheng Xiaoyan

程晓燕 著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以小搏大

——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

程晓燕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小博大：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 / 程晓燕
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ISBN 978-7-305-16185-8

I. ①以… II. ①程… III. ①巴黎和谈(1968—
1973)—史料 IV. ①D833.3②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233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书 名 以小博大——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
著 者 程晓燕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32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185-8
定 价 6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礼记·学记》有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与学原本一体两面，是师生共同的事业，非独教师单方面的“传道、授业、解惑”。进而言之，教师亦须不断追求新知，一流的教学有赖于一流的研究。

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两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为大学，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和美国的两所著名大学共同创办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它于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创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建立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机构，旨在培养从事中美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专业精英，专业方向涵盖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环境—资源—能源、美国研究和中国研究等领域。

自1986年以来，联合证书项目已连续招收了28届学生。自2006年以来，联合硕士项目已招收八届学生。来自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近三千名具有杰出才能的学生从“中心”毕业，他们活跃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部门。

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氛围，中外学生共同学习、生活，中外教授联合执教、相互切磋，以及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的管理制度等特征，构成了“中心”迄今在全国仍属独一无二的运行模式。在两校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中心”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国教学与研究机构，被海内外誉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典范。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唯有与时俱进,方能长盛不衰。在“中心”即将“三十而立”之际,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心”独特的国际化学术资源,加强对外交流,凝聚研究团队,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中心”师生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心得,反映南京大学的学术风格与研究水平,“中心”的几位中方教授经反复商讨,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本丛书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之命题,其义有三:首先,基于“中心”学术架构与办学特色,我们鼓励就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其次,鉴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各类问题密切关联的现实,我们不但要研究中美两个大国各自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当代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要把中国、美国以及中美关系问题置于当代世界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复次,当今世界各种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全球与地区层次上的政治、经济、贸易、金融问题,还是诸如暴力冲突、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难民以及环境、生态、资源、能源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乃至国际体系的制度变迁与秩序改良、多元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也理当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总之,探讨各类国际与国内问题,考察各种双边与多边国际关系,我们不仅强调中国视角与本土关怀,也倡导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

我们不仅期待海内外校友惠赐大作、玉汝于成,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共襄此举。

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出版之列。必要时我们还将出版各类专题系列成果。我们希望,将来集腋成裘,或可蔚为大观。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让我们携手浇灌我们的精神花园,共赴思想之旅,同铸大学之魂。

论丛编委会

序

“史学研究之不断推陈出新，与档案史料的挖掘、整理并有系统出版，若马车之两轮，似鸟类之双翼，缺一不可，乃史学发展的不二法门。”用著名史学家陈三井教授的这段话来解释程晓燕博士这本专著的成功最恰当不过了。晓燕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历史学科中磨练二十多年，已深窥史学研究之门径，《以小搏大——越美巴黎谈判（1968—1973）》一书，便是她良好学术素养的见证。晓燕从8年前潜心做这项开拓性研究，极其注意用外交档案做探索基础，力争言必有据，由此得出许多难得的独到见解，将使我们对越战历史的认识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该书对越美巴黎谈判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实、系统的叙述，细致入微地呈现了谈判过程，并着重考察越南谈判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外交部长春水与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之间近五年的秘密会谈，尽可能真实、生动地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以“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态度多方搜集、发掘、甄别史料，锱铢积累。书中依据的黎德寿、春水与基辛格会谈纪录的材料近两千页之多，且是第一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给予研究者诸多便利，而且有助于促进研究风气，提升研究水准。作者驾驭材料颇为得心应手，从其清晰的思路和引人入胜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读者将不难看到，该书闪耀着史学大师陈寅恪倡导的所谓“问题意识”之灵光。晓燕从旧说中发现漏洞和不足，提出问题，经过仔细的论证，提出新创见，其中最具新意有以下两点：

（1）反对“唯冷战论”。作者认为，“唯冷战论”完全把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纳入到冷战框架下解读，完全用大国政策与冷战拆解越南抗美战争，大有不恰当之处。将两者等同、重叠起来，越南不只是大国博弈中一

颗微不足道的棋子、一个背景因素，而恰恰是这场冲突的中心，越南战争的本质不应被模糊乃至漠视。尽管越战发生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含有厚重的冷战色彩，但如果将越南抗美战争首先贴上冷战的标签，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也陷入了冷战思维。同样，作为结束战争的巴黎谈判，虽然离不开大国博弈的背景，但如果把这个背景作为问题的实质对待，就忽视了战争与谈判的越南属性，有喧宾夺主之嫌。

(2) 对“越战国际史”提出商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不断有学者倾向于从多个“行为体”来描述越南战争，可谓之“越战国际史”。《美国外交文件集之越南卷》的主编约翰·M. 卡兰德曾解释说，除了美国，还有其他角色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有身份，有能力作为，因此影响了战争和相关事件。这种看法从研究角度讲无疑是可取的。但“越战国际史”的学术意图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讳莫如深。晓燕同志则通过其研究道破了其中的天机，她揭示称，迄今为止“越战国际史”所作讨论的含义似乎都是在模糊越南战争的本质，对侵略和反侵略不加区分，对正义与邪恶不加甄别，进而将结束越战的巴黎谈判冠之以诸如“破碎的和平”“失去的和平”“苦涩的和平”等名称，而歌颂越南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声音则难得一见。晓燕同志力图表明，史学研究重在客观，但不等于没有情感，没有价值观判断。历史本身具有的真善美内涵，需要研究者把它们投射出来，这样的史学才是有生命和活力的。

越战已过去 40 年整，冷战也已消逝了 25 年，但当今世界却远未摆脱强权政治的阴影，国际舞台上种种丑恶的行径依然横行不止，令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深恶痛绝并忧心忡忡，以致有不少人在讨论爆发“新冷战”的可能。在这个时候，回顾越战和巴黎谈判的历程以求探究现代国际政治的本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我衷心希望晓燕的这本著作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有用的启示。

计秋枫

2015 年 7 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推动谈判到来	14
第一节 努力促成边打边谈	14
第二节 回应华府和谈试探	20
第三节 平衡对中苏的关系	29
第二章 华府战与和的抉择	34
第一节 战争能力趋向衰竭	34
第二节 越战共识严重破裂	41
第三节 收缩战争走向谈判	53
第三章 握手言和的开始	64
第一节 聚首巴黎却不易	64
第二节 挫败“以炸迫谈”	67
第三节 四方对话路漫漫	88
第四章 尼克松扩大战争	107
第一节 入侵柬埔寨扶植傀儡	107
第二节 在老挝的秘密战争	114
第三节 越南化难成救命稻草	119
第五章 黎德寿—基辛格秘密谈判	124
第一节 解铃还须系铃人	124
第二节 谈判桌上的较量	132
第三节 南方抗美战争形势	144

第六章 会谈两度僵局·····	151
第一节 华府设置撤军障碍·····	151
第二节 “我们不要中间人”·····	156
第三节 阮文绍的去留·····	165
第七章 越南提出三套方案·····	181
第一节 华府大争吵再掀高潮·····	181
第二节 拒绝莫斯科传声筒·····	188
第三节 南方政权问题·····	196
第八章 峰回路转·····	223
第一节 “两步走”解决越南问题·····	223
第二节 北京的劝告及越南的反应·····	226
第三节 确立协议基本条款·····	233
第九章 迟到的和平·····	250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出尔反尔·····	250
第二节 越南走到谈判的底线·····	256
第三节 签署巴黎和平协定·····	272
结 语·····	281
参考文献·····	287
附录一：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	295
附录二：索 引 ·····	304
后 记·····	309

绪 论

1968—1973年的越美巴黎谈判是最终促成侵越美军撤出越南,越南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事件。1973年1月,越美在巴黎签署和平协定,美国从越南撤军,结束其在印支长达近二十年的干涉。但比之美国为什么卷入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等,学界对它的关注远远不够。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史家讨论的重点虽然转向了现代化、文化、后殖民和国际冷战史视角下的越战等问题,但越美谈判的历史依然模糊。美国对外关系评论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戴维·安德森就曾指出,对越南战争外交层面的研究比战争层面少得多。^① 尽管如此,他认为“巴黎谈判仍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②。在2012年举行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关于尼克松和越南战争的圆桌会议”上,安德森谈到,“1973年1月的巴黎和平协议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议较多的”,围绕协议“形成了对谈判和协议的四种基本解释”。第一,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提出的“背后被捅”说,即虽然他们的外交是有效的,但首先是河内未能遵守协议,接着是国会拒绝在河内背信弃义之时提供援助;第二,“体面的间隔”论,这种观点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作为领导人出于国内和国际需要,要维护他们的信誉,白宫的目标就是为美国撤离时留下一个完好无损的越南共和国,并使之能支撑得足够长,以把美国为西贡最后的陷落所付的责任义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第三是伯曼提出的“永恒战争”说,在他看来,尼克松和基辛格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搞了这样一份协定,但私下里却计划重新部署武力以在河内破坏协议之时支持西贡;最后,以皮埃尔·阿瑟林和阮莲荒等学者为代表从国际史视角审视越战,既从北越的角度看待战争与和平的进程,也从南越、苏联、中国和美国的

^① Anderson, D. L., “The Vietnam War”, in Robert D. Schulzinger,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310.

^② “Roundtable 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Vietnam War”, in *Passport* (该刊物系美国外交关系史学家协会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 的通讯), Vol. 43, Number 3, Jan. 2013, p. 9. 该圆桌会议的参加者是《美国外交文件集:越南卷》(2010年出版)的编辑和越战研究领域的一些权威学者。

角度看待那段历史。^①《美国外交文件集：越南卷》(1972年1月到1973年1月卷)的主编约翰·M. 卡兰德在会上对上述四种解释做了如下回应。

1. 针对“背后被捅”说，卡兰德特别提起了一个小插曲。2010年8月，他与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就下个月国务院举行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会议上的发言顺序会谈的时候，霍尔布鲁克拒绝在基辛格之前发言，如果那样的话，就必须改变会议安排。因为霍尔布鲁克是主题发言人，应该(在国务卿希拉里简短的致辞之后)第一个讲话。霍尔布鲁克却说，基辛格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他的越南战争与和平协议，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指责国会政策失败和为南越的陷落买单。如果基辛格用这个调子说话，他就要做出反应。到时，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人，卡兰德就得担心发生尴尬的事情：霍尔布鲁克拒绝第一个发言，基辛格拒绝让霍尔布鲁克第二个讲话，其中一人或两人都选择退出会议。但最终，基辛格同意和霍尔布鲁克交换发言顺序。基辛格的讲话捍卫尼克松政府的谈判和战争政策，霍尔布鲁克紧随其后，告诉他美国卷入越南整个就是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关于国会的影响，基辛格讲了几句温和的话，火药味不是很浓，霍尔布鲁克并未马上反驳，显然，他打算用重型武器来对付基辛格指责国会为西贡^②陷落负责。因此，卡兰德认为，“考虑到《被抛弃的胜利：越战》(2006)、《一场美好的战争》(2007)、《黑色的四月：南越的陷落(1973—1975)》(2012)这些持“背后被捅”观点的著作，再联系上面的小插曲，那种由于领导人在国内这个战场上的错误行为而输掉战争的看法仍然在我们中间很有市场，尽管几乎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一点”^③。

2. “体面的间隔”论一直是其赞成者无法用证据支持的观点，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如此只顾自己和不够坦率，以致他们一定形成并执行“体面的间隔”。卡兰德认为它“如果不是不可能成立的至少也是困难的”。对它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皮埃尔·阿瑟林对《越南战争档案》的书评。阿瑟林认为所谓的(关于疯人理论和体面的间隔论)原创性结论至多是根据情形证据猜测和推断构成的，该书所谓“冒烟的枪”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真冒烟的。那

① “Roundtable 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Vietnam War”, *Passport*, Vol. 43, Number 3, Jan. 2013, p. 15.

② 西贡即今天的胡志明市，当时是南越共和国的首府，越南统一后改为胡志明市。

③ “Roundtable 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Vietnam War”, *Passport*, Vol. 43, Number 3, Jan. 2013, p. 23.

些倾向于这个观点的人往往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苏打交道的材料中寻找支持。如此就必须证明,用安德森的话说,“白宫的目标就是为美国撤离时留下一个完好无损的越南共和国,并使之能支撑得足够长,以把美国为西贡最后的陷落所付的责任义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个目标需要事先谋划,就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意图而言,有关的证据简直就不存在(当然,也许可能有,但费尽心力至今也还没有发现)。也不能说,“在1970年到1971年间的某个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需要,有意选择追求一个体面的间隔办法”。还有些问题需要用证据回答和支撑。这个决策何时发生?围绕这个决策的情景是怎样的?关于这个内容决策前的会议?肯定有会议,所以什么时候?会上有哪些人说了什么?证据何在?

3. 伯曼的“永恒战争”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逻辑上证据上都不能说明,在历史学界几乎没有起到抛砖引玉的影响。

4. 其他实体的角色(身份)理论:这个概念在过去十来年里一直得到诸如阿瑟林和阮莲芜这些学者直接和间接的主张。其核心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概念,即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早在1983年,拉尔夫·史密斯的开创性著作《越战国际史》就已经提出来了(本来应是五卷本,在他去世前已经出版了三卷)。《美国外交文件集》关于越南战争的各卷本与身份角色理论并不矛盾,尽管它们聚焦于美国的政策。事实上,在各卷本里,难以读到、也认识不到美国的行为有多少是对其他行为体行为的反应的材料。

很显然,“体面的间隔”论最具争议。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要么拒绝,要么忽视尼克松—基辛格体面间隔的解释。那些多少都接受体面间隔说的又定义不同,因而也只是草草提及。金布尔坚持“间隔论”,他说:“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对避免失败的定义意味着维持或者保留西贡的非共产党政府,尽管基辛格现在还否认尼克松政府追求体面间隔的战略,但他近来承认了这样几点:历史文献记录证实政府就体面的间隔发表过声明,巴黎协定是一个脆弱的协定,尼克松政府愿意遵守政治竞赛的结果,我们不会为维护一个政府无止尽地投入自己,而全然不顾所有能想到的后果。从那个意义上说,‘体面的间隔’这个词是有一定涵义的。”^①

毋庸置疑,关于巴黎协议的争论还将继续,圆桌对话代表了美国学界近

^① “Roundtable 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Vietnam War”, *Passport*, Vol. 43, Number 3, Jan. 2013, pp. 28-29.

年来的研究状况,却不免一叶障目之感。笔者认为透过它们远不够探究巴黎谈判的真相,有关谈判的研究仍需要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加里斯·波特的《被抛弃的和平》(1975)和艾伦·古德曼的《失去的和平》(1978)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描述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关于巴黎对话的权威性著作。1970年代资料缺乏,但加里斯·波特采访了当时亲历谈判的美国官员、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和部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这部早期作品尽可能地分析了美越双方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波特认为双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履行和平协议,实现越南和平的外交是失败的。^①《失去的和平》指出越美双方都错失了許多使战争尽早结束的机会。^②同样受资料的限制,艾伦·古德曼的描述多是推测甚至臆想,现在已经过时了。更重要的是,古德曼的观点有失客观。

结束越南战争是尼克松政府的头等大事。尼克松是凭借结束战争的竞选口号才上台的,所以但凡关于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探讨都回避不了越美谈判,可是对该问题的关注在1990年代末以前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多从美国的政策视角出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杰弗里·金布尔的《尼克松的越南战争》叙述尼克松政府面临的一系列困境,把美国的政策描述得富于变化,对手则显得死板简单,对越美谈判则轻描淡写。杰弗里·金布尔的《越南战争档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根据新证据检测《尼克松的越南战争》所做的结论,尤其要对一些关键的历史性问题重新进行思考”^③,“体面的间隔”论就是在此处提出的。如前所述,这个观点目前在美国学界争议很大。总体来看,该书点评文献资料,内容空泛,结构松散,以至于被认为“证据的拼凑,证据的筛选也不严格”。^④

冷战结束后,原苏东国家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越南近来也披露了新证据,夏威夷大学教授皮埃尔·阿瑟林曾指出,更多源自越南的情况“对我们

① Porter, G., *A Peace Denied: The United States, Vietnam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vii.

② Goodman, A. E., *The Lost Peace: America's Search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the Vietnam Wa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p. x.

③ Jeffrey Kimball, *The Vietnam War Files: Uncover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Nixon-Era Strateg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p. 3.

④ Pierre Asselin, "Kimball's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30), Jan. 2006, p. 166.

已经构成挑战”^①。皮埃尔·阿瑟林本人2002年发表的《苦涩的和平：华盛顿、河内和巴黎协定的形成》对河内在谈判过程中的积极努力予以肯定。阮莲荒高度评价该书“有史以来最公正地”看待越美两方，学术价值“超过70年代的作品”，指出阿瑟林提出了“一直被学界忽视的越美战争中的两个‘真相’”，外交中心和谈判行为体。^②阿瑟林认为外交问题在越战史研究中凤毛麟角，至于谈判行为体，除了华盛顿外，作者主要聚焦“铁幕的另一边”——民族解放阵线和河内，主要是河内的作用。著作的不足主要是：一、所谓的“外交中心”体现得不十分明显。金布尔在2003年第27卷第5期《外交史》杂志上就《苦涩的和平》发表的书评认为，外交和军事是齐头并进或交错而行，没有哪一个是中心，可能某个时刻是其中一种考虑压倒另一种考虑。对共产党方面而言，其口号是“边打边谈”，对尼克松政府，其手段是胡萝卜加大棒。^③皮埃尔·阿瑟林还谈到西贡在谈判中的作用，奇怪的是没采用位于胡志明市的国家第二档案馆收藏的越南共和国的材料，关于中苏在谈判过程中的角色，作者着墨较少。二、全书结构布局失衡，七章中有五章都集中于描述1972年的情况，虽然1972年是和谈的关键阶段，但作者对整个谈判过程的描述是不完整的。

阮莲荒的《河内的战争：为越南实现和平的战争的国际史》(2012)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缺陷。该书前四章考察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南越195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叛乱”到1968年新春攻势之间北越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第二部分考察了阮所说的“实现和平的战争”——1968年后各方都试图向对方提出和平条件的战争。黎笋和黎德寿的关系就像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关系^④，每一对搭档都确信将战争升级，配合新的外交行动就能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让步。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中取胜，也未能通过越南化巩固南越，但和中苏的三角外交成功地推动北京和莫斯科对河

① Pierre Asselin, “Update on Vietnam’s ‘New Evidence’”, *Passport*, Vol. 37, Issue 1, April 2006.

② Lien-Hang T. Nguyen, “A Bitter Peace: Washington, Hanoi, and the Making of the Paris Agreement by Pierre Assel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1, Feb., 2004, p. 127.

③ Jeffrey Kimball, “Fighting and Talking”,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7, No. 5, November 2003, p. 764.

④ Lien-Hang T. Nguyen, *Hanoi’s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p. 129.

内施加巨大的压力接受美国的条件。北越被他们的大国赞助人“出卖”了^①,1972年共产党的春季攻势也被击败了。关于阮文绍在面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背叛时的关键作用,不像以往描述得那样无能。阮莲芳认为阮和他的官员们非常精明灵活,通过地区外交和他们的能力从华盛顿得到让步。在她看来,为和平而战的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巴黎协定与其说是一个突破口不如说反映了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②

爱德华·米勒在《黎笋的战争》这篇书评中写道,“该书正如其名,表现越南中心的历史——特别是聚焦北越和它的领导人的战略以及战争目标。然而,该书也是一本真正的国际史,对美苏中的角色和他们提供的档案材料给予相当的关注。此外,对南越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做了令人着迷的描述。她虽然远不是第一个这样书写这些角色的人,但她能驾驭各方情境,提出了许多非常原创性的见解”^③。这个评价在笔者看来,颇多溢美之词,与事实不相符。

首先,就其基本观点而言谈不上原创性,作者依然视巴黎协定为外交失败,与以往所谓“破碎的和平”“失去的和平”“苦涩的和平”如出一辙,即使使用了最新的证据,如黎笋妻子的回忆录,充其量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其次,作者提到“将河内而不是华盛顿置于越南战争国际史的中心”^④,力图表现跟以往的研究确有不同。即使从头至尾都强调越南的角色,使用再多的越南材料,但没有站在越南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也不是真正的以越南为中心。

迄今为止,美国学界对越南战争有两个主要的研究取向:第一是“美国中心”,即对越南战争的研究都是从美国的政策视角出发,长期以来的一个“学术禁忌就是反对从北纬17度南北两边来解答那段不正当的战争岁月”^⑤。安德森认为,造成“美国中心”现象的原因,一是美国和越南缺少长

① Lien-Hang T. Nguyen, *Hanoi's War*, p. 311.

② *Ibid.*, p. 11.

③ Edward Miller, “Le Duan's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5, November 2013, p. 1171.

④ Lien-Hang T. Nguyen, *Hanoi's War*, p. 4. 昂晨观(Ang Cheng Guan)《来自另一边的越南战争》(2002)概括总结了共产党政策和外交的经历。罗伯特·伯明翰《游击外交:民族解放阵线的外交关系和越南战争》(1998)追溯民解的外交立场的演变。阮先雄(Nguyen Tien Hung)的《独立宫档案》(1986)则提供了西贡的视角,其中包含了许多有用的关于西贡的信息,阮富德(Nguyen Phu Duc)《越南和平谈判》(2005)也是如此。

⑤ Lien-Hang T. Nguyen, “A Bitter Peace”, p. 127.

期打交道的经验,因而较少研究双边关系;二是许多档案材料来自美国方面。^①然而,过去10多年来,相当一批学者不再对“铁幕的另一边”置之不理,“将河内而不是华盛顿置于越南战争国际史的中心”,较多反映越南的政策、战略和活动,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新生代学者。A. J. 兰古思在《美国在越南的战争(1954—1975)》的扉页上写下了越南人的一句话“美国人认为越南是一场战争,我们知道越南是我们的祖国”就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些学者的主张。这股“发展中的史学动向”虽然尽可能多地展现越南抗美力量的政策、战略和作战努力,力求突出越南的重要性,貌似抛弃了某些偏见,但依然一律视越南南方人民革命为“叛乱”,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他们仍然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其评判标准,反对殖民侵略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主题在美国的越战史学中是根本不见踪影的,从这点上说,美国的越战史研究还是未能脱离“美国中心”的窠臼,也可见该研究取向与缺乏“铁幕另一边”的档案材料没有必然关系。因此,尽管皮埃尔·阿瑟林、阮莲荒等新生代学者主张尽可能多利用越南的材料,但终究还是反映美国人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学者一方面聚焦越南,另一方面提出所谓“行为体”的概念,倾向于从多个行为体来描述越南战争,即除了美国,还有其他角色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有身份,有能力作为,影响了战争和相关事件。因此,谓之“越战国际史”。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早在1983年,拉尔夫·史密斯的开创性著作《越战国际史》就已经提出来了,只不过在近年来学者更多探讨越南角色的趋势下,“越战国际史”显得略为丰富些而已。从研究角度讲,这无疑是可取的,但“越战国际史”的学术意图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讳莫如深。甚至有人主张“越南战争事实上是许多个战争,历史学家只是刚刚开始探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它们那里,历史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区别,看不到是非曲直,只有成败,每一个人都是“行为体”,对侵略和反侵略不加区分,在这些新生代学者的视野里,歌颂越南反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当然就难得一见了。

第二个取向是以冷战史的视角解读越战。冷战结束前后到90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刮起了“新冷战史学”,即利用多国档案材料相互印证,重评冷战。在挪威、俄国和英美等国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国际冷战史”研究兴起。学者们在一般意义上反思什么是冷战的同时对具体的冷战危机关注尤多,

^① Anderson, D. L., *op. cit.*, p. 310.

印支冷战就是热议的话题之一。显而易见,如果不在冷战视角下审视越南战争,那么冷战各方的行为和动机将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然而,即使越南抗美战争和印支冷战密不可分,但是越南抗美战争本身的独立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越南人民坚持斗争数十年,伤亡近百万,经济损失更难以估量,而美国在越南甩下的炸药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四倍,耗费数百亿美元,5万人抛尸于异国荒野,仅仅这些数字就说明用大国政策与冷战拆解越南抗美战争是很不恰当的。尽管它发生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具有很厚重的冷战色彩,但如果将越南抗美战争首先贴上冷战的标签,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也陷入了冷战思维。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苏联学者伊利亚·盖杜克的《苏联和越战》(1996),她考察了莫斯科从1964年到1973年在越战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苏联奉行的是“双轨政策”,即一面大力援助越南,一面敦促谈判解决冲突,两者不矛盾。莫斯科清楚战争打下去是极其危险的,但出于维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形象这样的意识形态因素,必须表明不是只有北京才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因此,莫斯科处理和河内的关系非常谨慎,对来自美国敦促莫斯科向河内施压的要求一推再推。^①华裔学者翟强的《中国和越战》、陈兼的《毛的中国和冷战》有关中国档案的新证据很详细,但有研究认为“他们过于依赖中国材料使得他们从中国眼中看越南,反倒比他们和北京交流获得的实际情况要被动,特别是跟中苏分歧有关的方面”^②。学者们普遍认为,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并指责苏联缺乏革命的战斗精神,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的双重意义,“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所谓的输出革命等对中国外交造成极大干扰。

笔者以为,对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怎样评判是个需要以理性对待的问题。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摩根索一直是越南战争最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但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国家利益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中国对非洲和拉美革命运动的支持是一种边缘性的事业,可以说带有一

①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Ivan R. Dee, Chicago, 1996, pp. 248-249.

② Pierre Asselin, “‘We Don’t Want a Munich’: Hanoi’s Diplomatic Strategy, 1965—1968”,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 3, June 2012, p. 549.